

北京歷劫記 (三)

近藤妙子作。陳鵬仁譯

沒有人敢跟我講話

與李宛君共同生活三個月以後，我突然被帶離這個房間。若是，令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，可能是趙鳴和朱惠芝的策略。我被拉到醫院的一個房間，並在大約三十個人的面前，問我跟李宛君到底談了些什麼；我說我們談了很多。要是我不說，李宛君早晚會說的。我們說的大多沒罪，但其中一件事犯了「重大罪過」，那就是罵江青混蛋，由於這件事，我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，壁報也寫成「反革命份子王鶴卿」，旁邊有李宛君的名字。不只是訊問，被押到單人房時，更要我寫談話的內容，為此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。這個房間隔壁是太平間，但我却一點也不害怕，既然被戴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

我以改造自己思想的心情，早上一起來就開始打掃廁所。我這樣作，醫院同事的反應好像很不錯。及至三月底，大家對我的態度顯然有變化，於是我又繼續努力打掃廁所。

不久，敵人准許我回家，李宛君也是一樣。快樂時，一年很快就過去，但痛苦的一年，實在太長了。想到自己能回家，我高興極了。我吸着新鮮的空氣，走着宣武門大街回到家。一年雖然很長，但路旁的商店却一點也沒變。到家時，我女兒等着我，她微笑着迎接我。我問她：「妳知

道我要回來嗎？」她答說：「今天早上，醫院通知我了。」從前，我家住五個人，我先生、我、女兒、我先生的妹妹（醫師）和佣人；現在却只剩我們兩個人。我先生被拘留中；我先生的妹妹，因為受到我們的連累，而被送到幹部學校去從事勞動（再教育）；佣人以不許在「有問題的家」工作，而被逼回家。

我們夫妻和女兒的房間都被貼上封印，不准進去，因此我倆祇好使用佣人的屋子。而住在我們宿舍的人，因為我被扣留很久，而且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，所以沒有人敢跟我講話。

月經嚇斷女兒懼病

我被扣留以後，我女兒的生活非常困苦。由於我們的房間被封閉，拿不到現款，因此她連一塊錢也沒有。據說，她因為這種休克，月經停掉，變成半病人，當時還在的佣人煎藥給她吃，但還是不能完全好。

醫院也沒有給她錢，佣人的親戚看不過去，給她一點錢，但佣人和我女兒都營養不良，臉色蒼白。不得已，我女兒幾乎每天到同學家去做食客，並和同學一起去游泳。聽說同學家的人常常安慰她，真是謝天謝地。隣居也幫助我女兒，他們教我女兒請軍隊幫忙。我女兒到學校去向軍人訴苦，軍人以小孩無罪，而給醫院打了兩次電話

，結果醫院才每個月給我女兒十五元。

她以這一點點錢，勉強維持生活，但最可告慰的是，以前不會燒飯的她，今日却能作各種各樣的菜。我回家時，她知道我被扣留時祇吃些很差的菜，所以就到市場買特價的蕃茄跟雞蛋炒給我吃。她燒菜大多跟以前住在我家倉庫作看守的醫院廚子學的。他從前和我們夫妻很要好，因此心裏可能很同情我們，他看我女兒孤零零地，因而教她燒飯作菜。由於這種原因，我女兒便能作餃子、肉饅頭（包子）和肉菜。

的確，我女兒一出生家裡就有佣人，因此不要說燒飯作菜，連衣服也不會洗，更沒有拿錢到外面去購買食物的經驗。她早晨要吃塗黃油和果子醬的麵包，惟因花時間，故有時候遲到學校。在生活上，她從沒有吃過苦。

食物也可能屬於「奢侈」的家庭。我先生雖然不抽煙不喝酒，但却很重吃；因此為給我先生作好吃的菜，佣人每天得相當用腦筋，每餐都有雞肉、豬肉等四、五樣菜。不特此，我先生又喜歡到餐館吃飯，祇要知道或聽到好吃的，路途再遠也要去。這樣，我們的薪水還是有剩。我先生常說，我們每個月有收入，所以不必存錢。以往，我每個月給佣人每人份三十元，四個人份共一百二十元的膳食費，但自我被扣留以後，我女兒和佣人則以十五元過日子。不過，吃苦似使我女

兒「成人」。我回來後，我的月薪是四十三元，扣除房租、電費和自來水費還有三十八元，因此還能過活。

洗化驗室大小便器

我雖然回到了家，但却不是一切如意的人。我得參加那十個醫生和護士從事的「勞動改造」。

由於我被長期拘留和營養不足，因而時或會覺得頭暈，但這是不成理由的。我參加勞動改造以後，那十個人便一個一個獲得「自由」，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，因此我很盼望自己也能早日跟他們一樣。我「勞動改造」的工作是洗化驗室的大小便器，這是醫院裏最骯髒的差事，分量又多，我承擔了三個人的工作量。我早晨六點鐘就上班，洗刷化驗室用過的試驗管和培養細胞的玻璃器具。工作的順序是首先用水洗玻璃容器，然後予以高壓消毒，最後用酒精擦乾淨；有時候，把容器放在消毒器裏忘記就回家，回家後想起來又趕回醫院去。有一次，來了六十個培養紅色和黃色細菌的盤子，而使我束手無策。正在流行肝炎和赤痢時，我真擔心自己會不會感染。這時，有很親切的護士教我補補外科手術用的破橡膠手套試試看，於是我遂向她們要來破橡膠手套試試，但立刻會破洞，無法使用。

除洗刷大小便器外，我還有一件工作要做，那就是洗藥瓶。每籠裝一百支玻璃瓶的籠子，在屋子外邊堆積如山，我一次洗五籠，然後把它裝在五個布袋去消毒，爾後送到藥劑師的房間。不過說來也不可思議，他們要我洗最骯髒有細菌的

化驗室東西，同時又要我去洗患者得拿到嘴裏的藥瓶（其為不衛生，莫此為甚。譯者）。

有時候，我會比較這樣忙碌和以前的拘留生活那一種情況比較好些，我覺得忙碌能忘掉一切，所以我喜歡前者。

夫婿死了不准我哭
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我正在化驗室洗藥瓶的時候，人事課的女職員把我喊去。我把手洗乾淨，到以前我被拘留的第五病房，現在是院長室兼黨支部辦公室，書記由朱惠芝換成王靜。

一進屋子，我看到公安局局員和王靜坐在那裏，板着臉盯着我；瞬間，我感覺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，公安局局員范曹賢說：「王鶴卿，妳的愛人王和成昨天死了，原因是胃潰瘍，是手術中死亡的。」頓時，我覺得好像被推下豁谷，但我却故意裝鎮靜。王靜說：「妳不可以哭，他是罪人，所以不能哭鬧。」公安局局員范曹賢問我不要我先生的屍體。我先生死於山西省臨汾的「第三監獄」，但我却以為他死在北京的「第一監獄」。我的腦筋混亂不堪，慢慢清醒以後，我想到：第一、我沒錢；第二、沒人能夠從第一監獄把屍體送到八寶山的火葬場；第三、我仍然為受監視的人。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我先生究竟是怎麼死的，並把他埋葬。我正在迷惑的時候，范曹賢說：「妳不可以接近罪人，妳雖然受監視，但不是罪人，因此應該與罪人有別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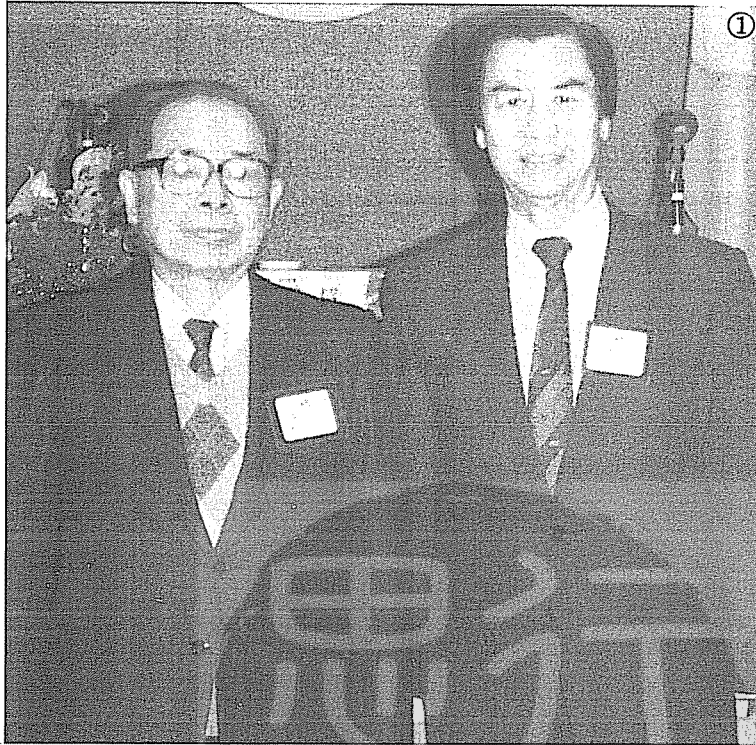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我要跟我女兒一起活下去。我如果看到我先生屍體，也許會變成沒有力氣。我心裏想

，對我先生來說，離開這個苦海，到毫無束縛的地方去，可能更幸福。我尤其認為，回憶我先生屍體的悲慘樣子，不如回想以往我先生健康的笑臉來得有意義；而我相信我先生也贊成我的想法。因此，我斷然地說：「請公安局處理。」范曹賢說：「那麼改天再通知妳來領衣服。」於是我遂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。中午，我回家告訴我女兒，她父親死了，她嚇得說不出話來。她聽我說決定由公安局去處理屍體，非常生氣。她說沒錢可以向朋友借，她又很想給她父親穿新衣服；隨即不見踪影。原來她到醫院去懇求要回我先生的屍體，但王靜沒有接受她的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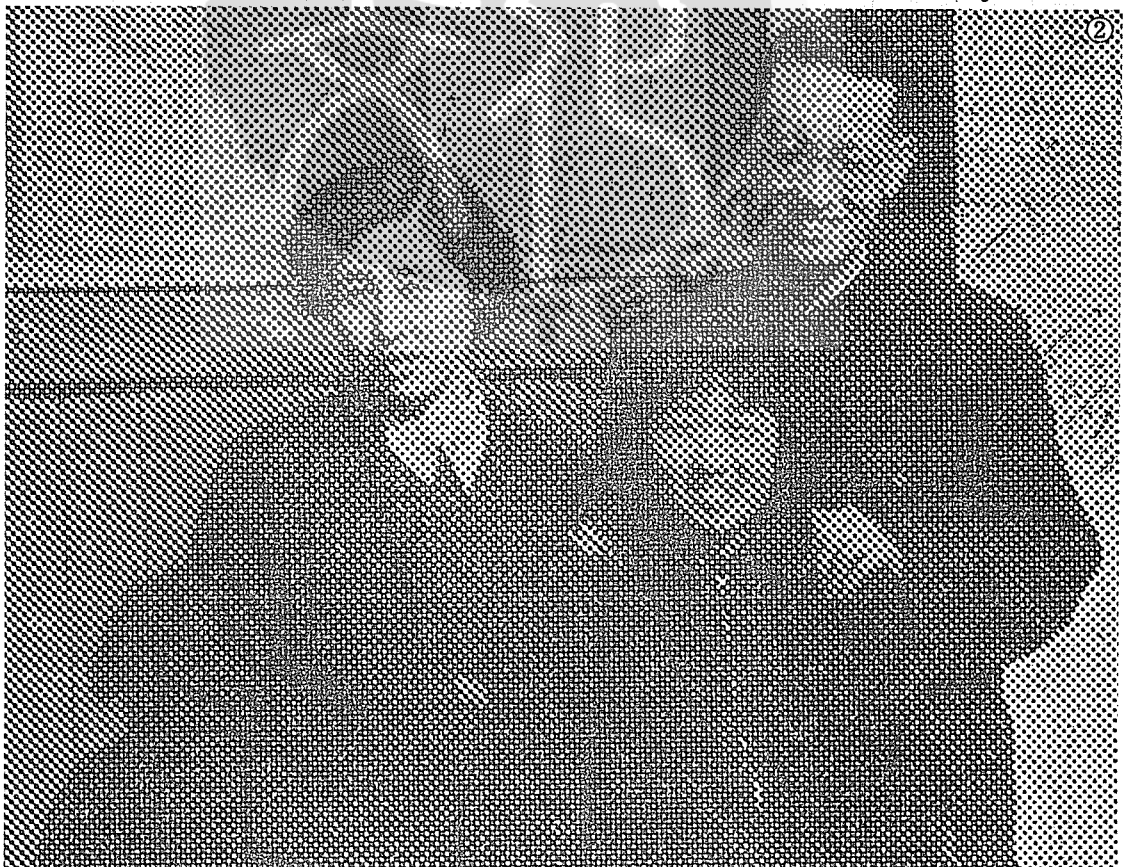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下午一點鐘，我照樣回醫院繼續工作，隻字不提我先生去世的事，但心裡却怒火沖天，我先生的背影彷彿在眼前，我恨他未能堅持到底。據說，連「國家主席」劉少奇也在中南海被迫勞動。我所目睹的劉少奇那麼健康，現在不知道怎麼樣？可能過着沒有好東西吃，天天做苦工的日子。今日，我的骨肉親人祇有我女兒一個人，為她，我一定要堅持到底。

死人財物也遭洗劫

經過大約三個月以後，「公安局」通知我去領取我先生的衣服。我跟我女兒帶着大包袱布和背包，前往指定之位於北京南邊的「第一監獄」門前。在等待「公安局局員」時，我回想以往的種種。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我和我先生曾經遊於陶然亭公園，當時不知何故，我倆竟走到這個監獄的大門附近；我想像，被關在這種有高牆若城堡



① 譯者陳鵬仁教授（右）與林金生（左）合影。
② 作者近藤妙子（左）偕夫婿王和成（右）與女兒合影。



的地方，不知道是犯了何種重大罪過的人。我先說，他有時候因為監獄醫院的邀請，而來為這裏的人動大手術。難怪偶爾有吉普車來接送他。當時那麼開朗笑着的我先生，今日竟被收容在這個監獄裏！這是神的何種安排（作孽）！監獄也會關些沒有罪過的人，我這樣想着。

正當此時，以前在醫院見過面的「公安局員」范曹賢出來了，他看到我又進去。隨即出來了一個陌生的「公安局員」，他說：「這些是妳先生身上的東西。」於是把皮大衣、褲子、洗臉用具、內衣和眼鏡交給我。我楞了一楞，棉被、毛毯、手錶和鋼筆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問他，他說都丟了。我一向以為「公安局」最誠實、最可靠，所以至今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會搶死人的財物。而令我最傷心的是，我先生死時祇剩八毛錢，在監獄裏他想買東西根本就沒錢。

又驚又怕圖脫苦海

我一直沒有跟以前一起回日本省親的P小姐（日本太太）交談的機會，她先生是另一個醫院的內科醫師。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，P小姐來看正在洗玻璃瓶子的我，她說，她獲得了回國的許可，她們將於四月間全家四人回日本。我非常羨慕她，我雖然也很想回去，但是不是能夠申請毫無把握。三月的某日，我在洗瓶子的時候，派駐在醫院的中共軍「隊長」來找我，我懷疑將再發生什麼事，但他却笑着說：「今天P小姐全家搭機回日本去了。她們在上海附近玩兩三天以後，將經由香港回到東京。妳不想回日本嗎？如果要

回去，妳應該在南部玩玩再回去。」

這個「隊長」的名字叫做趙正委，起初我以為他在撒謊，但看他的眼神又似乎不像。我戰戰兢兢問他：「我也可以回日本嗎？」他回答說：「當然。」並要我提出申請就走了。我很高興。

隔天我把申請書送到王靜那裏去，他們覺得很意外。我看穿了，他們一定會找我麻煩的。因為我跟P小姐的立場完全不同，為了禁止我把文化大革命時所受的折磨回到日本告訴日本人，他們勢必百般阻撓。

醫院裏又開始了新的學習，那是有關「我們親愛的毛主席的戰友林彪副主席」死在某處。但對我來講，誰死跟我都無關；重要的是，怎樣纔能脫離這個苦海。我寫信給在日本的父親，請他幫忙。當時，家父已經是八十五歲的老人，為此事，他似乎到過東京幾趟，去拜託有關政府機關協助。當時，日本與中共已經建立「國交」，日本在北京設有大使館，大使是小川平四郎，堀野任領事。惟因我入了中國籍，所以不能自由出入日本大使館。中共的軍人持槍站在門口，日本人都由公安局領得紅色手冊，做為出入的憑證。

在大陸生活久的人，有不少具有雙重國籍。這種人在大陸算是中國人，回日本就是日本人，非常方便。假若我是日本國籍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我也許不會受到這樣嚴厲的欺侮。

可能是因為家父的請求奏了效，大使館來信要我前去。我以不報備逕赴大使館會發生麻煩，而跟黨支部商量。可是趙鳴却威脅我說：「妳是中國人，到日本大使館就是間諜。」我只好打電

話給堀野領事，以說明不能去的理由。堀野領事很親切地說，要來的時候，如先以電話聯繫，他將在門口等我。但我還是不敢去。

日本使館替我設法

由於大使館來信，我仍然沒去，因此大使館派人來看我。揀着日本國旗的大型車子停在醫院門口，並說要我，所以醫院的人大為驚愕。

我照常去洗瓶子時，黨支部的人突然來叫我。我穿着破圍裙進去，目的是要讓大使館的人知道我在這個醫院處於什麼境遇。我向大使館的人道歉說：「雖然接到來信，惟因身為中國國籍而不能去。」醫院裏立刻有種種關於我的傳說，說是家父與日本政府有什麼關係。這些壞蛋很緊張，設法儘早給我護照，以免發生意外。

我於三月間提出申請護照，至第三個月護照下來了。我很高興我能夠回日本。但仍舊有障礙，因為「公安局」雖然來了通知，但醫院的壞蛋依然不給我護照。不得已，我遂向「西城區衛生局」陳情，表示中共「政府」准許我回日本，但醫院的黨支部却不把護照交給我。跟我見面的女性「局長」，很親切地安慰我，並打電話給醫院，要他們馬上把護照送來。如此，我終於在西城區的派出所拿到護照。但趙鳴却對我提出一個條件，即把現在我住的房子騰出來。據送護照來的人說，好像趙鳴想住這棟寬敞的房子。

我聽這個人這樣說，更不想騰出房子。拿到護照的我，得向日本大使館申請簽證。我給堀野領事打了電話，他說他會在我到達門口的時候等

我。日本大使館位於北京市東邊，從我住的西單坐巴士要一個小時。到達大使館門口時，有位漂亮的小姐等着我，她是堀野領事的秘書。

我聽人家說，領事館（在大使館內）裏頭不但有日本人，還有一半是中共的「公安局局員」，因為很可怕，所以我辦完了事，就由堀野領事陪同出來。一到外面，我就覺得不大對勁，便衣警察竟在那裏等候我。我想糟糕了，但我還是硬着頭皮走過去，果然從後面跟來了兩部機車，在我後面停住，他們把我帶到大使館的另外一個警衛辦公室，並問我到大使館來作什麼。我拿護照給他們看，並說來辦理到日本的簽證手續。他們抄下了護照號碼以後，就讓我回家。從此兩個星期左右，我一直害怕會發生什麼事而睡不着覺。

胸骨撞斷女染肝炎

我仍照常洗瓶子，但却心不在焉；離開大陸以後，或許不會再到北京了，想到這裏，我却又不大想離開。人真是很奇怪的動物。

可能由於心不在焉，有一天晚上，因為沒有開燈，我踢到牀鋪脚，胸部碰到縫衣機角而倒下去。胸部很痛，我咬緊牙關躺在牀上，但睡不着；於是去請住在附近的外科醫生看看，他說背後有二分之一皮下出血，並說，外表看不出骨頭怎麼樣，明天到醫院再給我藥。翌日照常去工作，惟因胸部疼痛不堪，故請了兩天假。但經過兩個星期還沒好，於是到門診部外科受診，他們要我照X光，結果說是斷了兩支肋骨。

因此我獲得了三個月的假期。醫生說我已經

站着工作兩個星期了，所以在家裏療養很快就能够痊癒。由於我折斷了骨頭，敵人祇好找別人替我洗化驗室的瓶子。於是我便在家裏趕緊作回日本的準備。我把銀行的存款全部領出來，買了皮毛衣（一千元）、翡翠戒指和毛皮圍巾等等；同時天天和女兒到北京的各種飯店去吃飯。剩下的錢，我決定分給我的妹妹和佣人。

同日本的日期一接近，我們得打霍亂和麻疹預防針。我們到安定門外的防疫醫院去打針，可是那天晚上發生一件很意外的事情，那就是我女兒患了肝炎。她的白血球數增加、發燒，我們手忙腳亂。好在義妹是內科醫生，遂由她每天給我女兒打針、量白血球，如此漸漸恢復了健康，但經過五個月以後纔痊癒。因為回國期限將屆，爲了要再延期三個月，便往訪大使館的堀野領事，他笑着說，他以為我們老早回日本去了。然後替我們辦了手續。

共幹還要大搞統戰

我決定回日本後，醫院同事對我的態度就逐漸有所改變。王靜已經他調，而由女性王昇接任黨支部書記。王昇與我先生來往相當久。

王昇請我去，大談中共和日本「友好」的意義，並說有什麼問題找醫院，如果回日本時的行李太多，可以用醫院的車子送我們，同時給我三個月的新水。

抓雀運動人比鳥累

再過兩個月，我就要告別住了二十七年的北

京，因此我們決心再去看看以前去過的地方。二十七年來，有過許許多多的往事。

我初次到北京的時候（一九四五年六月），還未滿三十歲。那時到處有攤販，馬路很髒，但却很有人情味。東單與西單之間有木製電車；我常常陪婆婆到親戚家裏。有一天，我提了三個袋子，下電車的時候丟了手提包，這是家父在京都四條通的「香取屋」買給我的，但我沒對我先生和婆婆說我丟了重要的東西。我們也常去天安門的中山公園。一到冬天，水溝便結冰，年輕人則在上面溜冰。我雖然不會滑，但在奉天度過中學時代的我先生却滑得很好，我先生常常帶女兒去溜冰。萬壽山無論春夏秋冬都很適於散步，非常廣闊，西太后所造的漂亮的湖和建築物，說明了其何等榮華。我們尤其喜歡從前山走到後山。春季時節，杏花和迎春花開得很美，日本人所種植的櫻花也很吸引人。夏天時，我先生常和女兒到萬壽山的昆明湖游泳。雖然有些地方爛泥積得很深，但水却很清澈。我最後一次到萬壽山是在冬天。當時天空陰暗，沒什麼人。我獨自走到後山去，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遊萬壽山。路上的石頭和建築却跟與我先生一起去的時候沒兩樣。我感慨人的脆弱、虛幻和命運的苛刻。

在醫院裏的經驗也是形形色色。說是愛國衛生運動，大家拚命打蒼蠅和蚊子；又說是因為麻雀要吃稻子，而展開捕捉麻雀的運動，作法是爬上屋頂揮旗子，一直揮到麻雀飛果掉下來爲止。但這樣做，人比麻雀還要累。

五月一日勞工節和十月一日「國慶節」是假

日。各「機關」的人，都前往天安門廣場集合，並為站在天安門樓上之「要人」揮手歡呼。晚上一定放焰火，天氣雖然很冷，但大家還是爭着看。從西單到東單的馬路，又寬又美，到處都是腳踏車。兩邊的路樹一到春天就盛開有如白繖子的花，花香撲鼻。當時，我不知道這就是日本所謂的洋槐樹。一九六二年，我回到日本，聽得西田佐知子唱「洋槐樹的兩停時」這個流行歌曲的時候，纔知道北京的那種樹便是洋槐樹。因此我買回這張唱片，走這條路時就哼這首歌。

動物園很大，動物屋舍是新式的，許多房間有暖氣設備。我邊看這些建築物，邊感嘆動物比人值錢。猴子、狗熊、長頸鹿、河馬都佔着很大的空間，自由自在，好像很幸福的樣子。也有四、五隻熊貓，爭先恐後搶着要照像。

不歡迎的人來送行

我女兒的肝炎既好了八成，日本的入境期限也已迫在眉睫。因此我們決定十二月三十日啓程回日本。行李是兩個柳條包和三個皮箱。那時沒有飛機直飛日本，祇好坐船，行李多無所謂，但要送到港口非常費事。

能帶出去的外匯極其有限，兩個人加起來祇能帶二百元（日幣三萬二千元），所以買禮品剩下的錢，給我先生妹妹一千元，佣人七百元。

醫院的人說我們回日本時要送我們到天津，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，因此我們到醫院去辭行。王昇笑咪咪地說，回到日本以後，希望給她寫信，一路上要特別留意。我問她，誰送我

們？她說的四個人當中，雖然有三個人我不太喜歡，但不好意思反對，另外一個人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整過我們夫妻，因此我拒絕了。

當時，北京的汽車很少，連我們這樣大的醫院也祇有一部急救車，卡車工廠才有，小汽車是高幹專用的。我們坐的是有紅十字標幟的急救車。本來，他們來送我們，我們應該感激，惟因我不大喜歡這些人，所以幾乎沒有跟他們交談，但我們還是向他們說了聲「再見」。

翡翠戒指險遭沒收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，我們從天津新港口搭乘貨輪，船錢一個人三萬日元。這是運送岩鹽的船，所以船裏全是鹽。我們在海關檢查行李，毛皮大衣祇有一件，沒問題，但五百元的翡翠戒指發生小插曲。由於回過日本兩次，知道海關的情形，所以我祇帶一個戒指。海關的人說，他要暫時保管這個戒指，因此我以為被沒收了。

天津新港的海面，此時已結了大約十公分厚的冰，我擔心這條船是否能破冰而行。三十日，在船上住一晚。船位是頭等，也是大副的房間，所以很寬敞。在房間小憩時，剛才那個海關的人來通知我戒指可以帶回去，並把它交給我。我很懇切地謝了他。船於三十一日開航，由於開得非常順利，因而幾乎不知道船何時啓航。我所擔心的結冰，毫不成問題，而我發覺時，船已經在港外。船裏的伙食極好。因為是除夕，所以每個人一隻鷄，還有生魚片和炒豬肉等等，幾乎吃不完。船長和大副都在喝威士忌酒。酒喝多了，大家

便自然而然地開始跳舞和唱歌。我也唱了「洋槐樹的兩停時」，獲得大家的喝采。也有人唱五木希羅西（希羅西是音譯）的「夜裏的天空」，和森進一的「襟裳呷」。這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晚上。在北京過新年時，佣人要買七、八公斤豬肉，做紅燒豬肉、煮鷄、作圓子，在屋子外邊擺水缸，因為天氣冷，水缸可以當冰箱用。我先生在世時，過新年都要到他叔叔家作客，叔叔家有很好的上海菜廚子。他已經八十多歲，是中共的高幹，門口有「公安局」的人站崗，坐的是蘇聯車子。我先生很依恃他。這個叔叔於八十四歲死了，我先生接着跟他而去。但最近兩年，我們沒有過新年，因為我們的情況已經不如以前了，因此能夠在日本船上飽嚼日本料理，實在太幸運了。加以沒有人知道我被戴過反革命份子的帽子，所以更覺得輕鬆。船長態度和藹可親，他說他送過幾個人回日本，也聽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情形。他問我怎麼樣，我簡單地說明了我的身世，船員們都很同情我。從上船那一天起，我和女兒便幫忙替我們照料伙食的茶房。茶房要從廚房端飯菜到三樓我們的房間，非常辛苦，因此我們幫忙他洗餐具。船長很高興地說，坐過這條船的乘客很多，但從沒見過妳們這樣的乘客。

帶著餘悸回到日本

船於三日早上抵達德山港，船長替我們給家兄打了電報，八十五歲的家父到德山港來接我們。我終於回到了日本國土。（全文完）（譯自「北京三十年」一書）